

文史史料

WENHUA SHILIAO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化史料

丛刊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文 化 史 料

(丛刊)

第 五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妙峰山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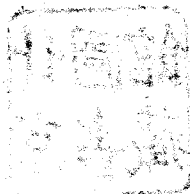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3年2月第一版·198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7¹¹/₁₆ 字数：167,000

印数：1—11,500册 定价：0.86元

统一书号：11224·111



本辑内容简介

《文化史料》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一种丛刊。第五辑主要介绍几位著名艺术家和学者，如现代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画家张大千、语言学家黎锦熙、戏剧家田汉等。这些人物对我国的文化发展，或起过推动作用，或产生过较大影响，都曾做出过显著的贡献。同时也刊登了介绍胡适的文章。这一辑还选登了关于早期北京大学的史料，并续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袁世海同志的长篇回忆录《我的舞台生活》至本辑已登载到第四部分，以后还将陆续刊登。

本辑人物传记的作者多是有关人物的同事、朋友或弟子、亲属。内容翔实、感情真挚。文中附有照片。

《文化史料》丛刊编辑者

(按姓氏笔划顺序)

马彦祥	孔罗荪	刘开渠	吕长赋
沈从文	吴作人	吴世昌	张毕来
张西洛	张世龄	胡风纶	周士观
贺捷生	黄药眠		

本辑部分作者简介

廖辅叔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萧淑娴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家萧友梅的侄女。

贺澹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夫人。

吴作人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

田海男 戏剧家田汉之子。

朱 隼 1923年至1929年北京大学学生，北大教授朱希祖之子。

高一涵 北京大学教授。

张寿臣 著名曲艺艺人。

袁世海 中国京剧院副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目 录

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生	
..... 廖辅叔 (1)	
回忆我的叔父萧友梅	萧淑娴 (18)
忆黎锦熙先生	贺澹江 (37)
忆南国社的田汉和徐悲鸿	吴作人 (66)
我的父亲田汉与聂耳的战斗友情	田海男 (76)
张大千的生平和艺术	黄苗子 (84)
当代著名画家张大千	杨继仁 (99)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朱 楔 (160)
漫谈胡适	高一涵 (187)
关于胡适的二三事	洪静渊 (202)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下)	清华大学校史组 (206)
我的舞台生活(四)	袁世海 (222)

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

萧 友 梅 先 生

廖 辅 叔

1980年12月，萧友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会场上举办了一个小规模的音乐文献展览。其中有一幅题为“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全体摄影”的照片。只见一些穿着长袍马褂的人，或手扶低音提



萧友梅先生像
(1916年摄于柏林)

琴，或夹着小提琴，或双手压住定音鼓……大家一看，先是感到滑稽，随即转为严肃，知道这是“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的历史的见证。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管弦乐队，第一次演出贝多芬的交响乐，而第一位指挥即是萧友梅。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深切怀念这位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生。

萧友梅，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84年1月7日（光绪九年癸未十二月初十日）生于故乡石歧镇。五岁，随家移居澳门，就学于陈子褒的灌根草堂。“灌根”一词是从佛教的“醍醐灌顶”引伸来的。所谓“灌顶”是以智慧输入人的头顶。“灌根”则是灌溉根柢，亦即现在的所谓打好基础。这个书塾的取名，说明了陈子褒老师是一个严肃的读书人。萧家本来就是书香人家，加上灌根草堂的教育，萧友梅从小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史知识。他提交给莱比锡大学的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够引经据典，左右逢源，是与早年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

他名为友梅，别字思鹤，（联系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故事）这该是父亲给取的。后来又字雪朋。据他德文证书上的写法，正是萧邦姓氏的原文Chopin，可见是“萧邦”的谐音。他为什么要改字雪朋呢？梅雪争春，固然古有明文，但是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受到了萧邦身抱亡国之痛，不甘心屈服于沙皇暴政之下，宁愿流亡法国，支持波兰复国运动的爱国精神的感染。萧友梅留学日本期间，孙中山所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运动已经蓬勃开展。青年萧友梅与萧邦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很自然的。别字雪朋，也说明这是他在对西洋音乐有了相当的认识之后，才选上这个与萧邦谐音的名字的。

在澳门有一件事对这个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他家的一个邻居——葡萄牙牧师经常在家里演奏风琴。他越听越有味，终于会唱出不少听来的曲调。他后来在自述中写道，他当时“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他正式把唱歌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是在他回广州进入时敏学堂之后，时间是1899年。

时敏学堂属于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最有生气、最有成绩的学校之一。它创立于1898年。当时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还是诗、书、礼、易四堂及春秋二堂，还不曾摆脱旧式书院的格局，时敏学堂却已经设立国文、历史、地理、格致、算学、图画、唱歌、体育等课程，偏偏没有那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也是做官捷径的“八股制艺”。如果考虑到当时清朝还没有废除科举，那么，时敏学堂创办人目光的远大，就更加令人敬佩了。

萧友梅是时敏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1901年他们十名毕业生在堂长(校长)邓家仁率领之下前往日本留学。初去的时候是自费的，1906年才取得广东省官费留学生名额。他在取得官费之前，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除了家庭接济之外，他还经常担任留学生的课堂翻译，挣一点生活费作补充。原来当时大清帝国的许多留学生上课的时候听不懂话，必须花钱请一个翻译。一边是日本教师在讲课，一边由他跟着翻译。这也许是中国留学史上特有的轶闻吧。

他初到日本，先是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和唱歌，算是实现了他从童年起就要求学习音乐的愿望。这样过了五年，他在东京音乐学校唱歌科毕业。由于取得留学生官费，他进了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教育学，同时继续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1909年东京帝大毕业，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

日本邻近中国，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海外根据地。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时候，已经是萧家的座上客。1900年萧友梅在日本再见到孙中山，即经孙中山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是以学音乐出名的留学生，比较不受警探的注意。他的寓所因此也成为孙中山与他的信徒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商量革命活动的地方。萧友梅又不像其他革命家那样善于出谋划策，因此每当他们密商大计的时候，他就抱着廖仲恺的孩子在门外玩耍，实则担任望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几次武装起义。清政府非常痛恨孙中山，于是照会各国禁止孙中山在他们国内居留。1910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再去日本，日本已经答应了清政府的要求，协同缉捕孙中山。孙中山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窘境。这时候萧友梅挺身而出，让孙中山匿居自己的寓所，饮食生活全由萧友梅包下来，同时承担了孙中山与外界联络的全部工作。这样过了一个月，孙中山才避开侦探的耳目，秘密去了新加坡。〔注〕不久，萧友梅也束装返国。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以掩护，他参加了在北京保和殿举行的留学生考试，结果取得了文科举人的“出身”，并被任命为清政府学部（教育部）的视学。翌年，武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从此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的统治。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萧友梅为总统府秘书。4月1日，孙中山解除总统职务，萧友梅随之离开南京。先是游览了慕名已久的杭州西湖，当然也没有忘记梅妻鹤子的孤山处士林和靖，然后回广东去当教育司（教育厅）学校科科长。当时广东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不受袁世凯的控制，已经提出了男女同学的倡议。10月北京教育总长蔡元培通知萧友梅，说是官费问题已经解决。于是他再次出国，去德国莱比锡留学。

对萧友梅来说，官费留学不成问题后，成问题的是家庭的生活费用。原来萧父续娶的夫人养了十来个孩子，光靠萧友梅的哥哥实在不能应付全家生活费的支出。因此萧友梅出国留学，还得把他官费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寄回家中。他在德国生活俭朴异常，有一个时期还借住在修道院。

这次他留学目的地之所以选定莱比锡，是因为他要专攻音乐。他知道日本的音乐教育是取法德国的，再求深造，当然应该去德国，所谓取法乎上也。他在莱比锡也像在东京一样，兼读两个学校：莱比锡音乐院及莱比锡大学。莱比锡音乐院是门德尔松创办的，当时的乐坛泰斗如里曼、谢林等等都在两校任教。说到演出，又有世界闻名的布帛会馆音乐会及妥玛斯教堂合唱团，的确是学音乐的好地方。威廉帝国虽然是军国主义国家，大学却是非常自由的。学生迟到十五分钟不算迟到，所以有“学院一刻钟”的美称。萧友梅与众不同，他准时进入课室，让教师利用这十五分钟给他当面批改作业。他的结业证书上的各科评语都是“好”。“勤奋”这一项的评语则是“极好”。总评中又有“道德上无懈可击”的考语。据当时的留德同学说，像萧友梅那样始终没有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的人，差不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把别人上跳舞厅、坐咖啡馆的时间都用到学习上去了。

1916年春天，他在莱比锡音乐院的课程修毕，随即向莱比锡大学提出博士论文《中国古代乐器考》（这是中文通行的题名，德文实为《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7月通过，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主持论文答辩的教授是里曼。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海上交通陷于停顿，他无法及早返国。于是再到柏林大学继续研究。他选听的课目有哲学、教育

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等，同时也参加音乐学的讲习会。这时比较音乐学经过施统夫和霍恩博斯特尔等人的努力已经从当初以音乐文化的各个因素为重点扩大成为结合外民族的音乐观点作为整体，同时密切联系一切精神的与物质的文化加以考察的民族音乐学。因为时间的关系，萧友梅未能进行深入的、细致的研究，作为这一时期学习成果的纪念品，他写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有关的文章。除此之外，他还进柏林施特恩音乐院研究作曲、配器、指挥及古谱读法。他研究范围之广，用力之勤，都是当时音乐界少有的。

正当他迁居柏林，再求深造的时候，从10月底到11月初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先后传来黄兴、蔡锷相继逝世的消息。萧友梅对这两位伟人的逝世感到至深的悲痛，曾写成一首题为《哀悼引》的钢琴曲。据他的附注说，这是从贝多芬《英雄交响乐》的丧礼进行曲得到启发的，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早运用西洋曲技抒写深刻的感情的有数的乐曲之一。

德国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农产品一向是靠国外进口来补充的，协约国看准了德国的弱点，对德国实行封锁。到了1917年，据萧友梅的回忆，德国人民已经濒临绝粮的危险。他于是移居波森的乡村布什朵尔夫。波森原名波兹南，是波兰的领土。1815年波兰遭到俄、普、奥三国的瓜分，波兹南割给了普鲁士，到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归还波兰。他在那里自己动手种马铃薯，这才解决了缺粮的困难。波兹南由波兰收回之后，萧友梅仍返柏林居住。1918年，他终于登上返国的航程。

这一年他回国之后，先任教育部编审员，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一年之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欧美

考察教育归来，即聘萧为北京大学讲师，开始了他后来近二十年的音乐教育工作。

北京大学本来设有音乐研究会，设立这个讲座，目的在“研究高尚乐理，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特长，补中乐之缺点，使之以时进步。”过去限于人力，所谓理论之研究并未能迅速开展。现在萧友梅来了，音乐研究会的工作立刻大有起色。为了扩大影响，音乐研究会改名音乐传习所，活动范围也从学校内部改为面向社会。萧友梅主讲的和声学及音乐史，是第一次设立的课程，听讲的人踊跃异常，同时组有十七个人的管弦乐队，部分是从海关总税务司接收过来的，木管乐器及铜管乐器每一种只有一个人，没有乐器的那些声部则由钢琴担任演奏。说起来当然是够简陋的，然而总算有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而且让群众有了定期聆听纯正音乐甚至于交响乐的机会。有一次徐志摩在北京大学给学生讲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认为学生们“没有听过夜莺就是一个困难”，补救的办法是建议学生去听萧友梅指挥演出的“培德花芬的第六沁芳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沁芳南是交响乐原文的音译），因为曲中传出了夜莺的歌唱。

1920年北洋政府接受章太炎的建议，采用古歌《卿云歌》为国歌歌词，还设立了国歌研究会，公开征求曲谱。我们从鲁迅1920年的日记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的记载，如1月26日，“下午赴国歌研究会”。4月16日，“下午……赴国乐研究会”。6月7日，“下午赴国歌研究会”。10月10日，“午后赴美术学校国歌研究会听演唱”。评选的结果，萧友梅的曲谱获得通过。1921年7月正式颁布定为国歌。说起这首《卿云歌》，还有一段与陈毅元帅有关的故事。那年，陈毅与留法学生一起抗议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

损害中国留学生的合法权利，被法国警察投入监狱。陈毅同志在狱中也高唱过《卿云歌》，表现了中国人的浩然正气。

在1921年他担任北京大学讲师的同时，还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鉴于体育与音乐两科的要求各不相同，他建议两科分立，音乐科主任一职即由他担任，音乐教育从此才比较带有专业性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女子师范大学之后，他仍连任音乐系主任。1926年起他又兼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此外他还于1921年与赵元任等组织“乐友社”，1923年与刘天华、杨仲子等组织“国乐改进社”，大力推动我国音乐的研究与改进。

二十年代的中国，音乐教材是非常缺乏的。为了应付教学的需要，他往往是随写随教。1922年他的第一部歌曲集《今乐初集》出版，一年之后又出版了《新歌初集》。这些歌曲都是先写歌词，然后依照歌词的内容配上适当的曲调和钢琴伴奏，一洗过去依调填词的旧习。中国之有创作的艺术歌曲，无疑应以这两本歌曲集为主要的代表。歌词的作者易韦斋，早年曾参加以柳亚子为领袖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也是萧友梅在总统府秘书处的同事。可惜的是易韦斋终究是旧式文人，写起歌词来虽然力求创新，那些歌词总有点像那些“解放脚”。遣词造句，不大自然，从而影响了歌曲的推广。除了上述两本歌曲集之外，他还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了《唱歌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及《小提琴教科书》。他也曾根据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探索霓裳羽衣舞的结构，写成一首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交由他所指挥的管弦乐队公开演出。胡适的《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是纪念辛亥革命时期谋炸袁世凯（没有成功）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及谋炸良弼（成功了）的

彭家珍四位烈士的。但碑上却只有一个杨禹昌的名字，所以称为没字碑。萧友梅曾为这首诗谱曲。他还为胡适一首《平民学校校歌》的歌词配曲。歌中提出了“不作工的不配吃饭”的话。还有《五四纪念爱国歌》也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

萧友梅在北京六七年，虽然身兼数职，成为音乐教育的重镇，但是他梦寐以求的却是一所独立的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早在回国之初，他就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过一个创办音乐院的计划。教育部把计划送到财政部，财政部却原封不动地把计划退还给教育部。后来他的留日同学范源濂当上了教育总长，萧友梅还曾为他写的《民本歌》谱曲，此人算是对音乐比较有所了解的。萧友梅以为这一次有了指望了，范也真心答应支持他。可是在那军阀混战的年头，官场简直像是走马灯一样。萧友梅的预算计划还没有抄写完毕，范源濂已经下台了。到了张作霖高踞北京宝座的时候，那个教育总长刘哲来得更痛快，根本就要撤消北京国立九院校的所有音乐科系，他竟认为音乐是“伤风败俗”的玩艺云云。萧友梅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好黯然南下。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否极泰来”。这句话用在萧友梅的遭遇上倒是非常合适。撤消北京各院校的一切音乐科系，当然他是连一片立足之地都没有了。物极必反，等待萧友梅的却是要他去创办独立的音乐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向南京政府提出的创办音乐院的建议经过反复讨论——还有争论——终于通过了。不过说起来也真可怜，堂堂音乐院说好的六万元开办费始终没有发下来，只拿到第一个月的经费二千六百元，算是开办费。以后每月经费增加到三千元。1928年度起要求增加三千元，结果只批准了二千，每月经费定为五千元。其拮据是可想而知了。招生的时候碰到的困

难也不少，因为11月1日开始报名，这时别的学校老早已经开学，加以音乐这玩艺即使不像刘哲所说的“伤风败俗”，总是“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有的学生想报名，还不免徘徊观望。好在招生广告上写明“院长蔡元培，教务主任萧友梅”，这才使报名者壮了胆子，怀疑的家长也不敢坚持反对。因为蔡元培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决不会坑害青年的。于是乎来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以致于人们认为能够考上音专就已经算是一种荣誉。

如果说勤俭办学有什么标兵的话，那么，说萧友梅是最早的一个，该不算是过分夸大的。所谓勤俭办学，并不仅仅是会省钱就算了，这是要求用尽可能少的人，花尽可能少的钱，去办尽可能多的事，而且要把事情办好。试以注册工作为例，从学生报名、查验证件、计算成绩、填写证书、排课表、分琴房、订校历直到出通告、发通知，逢到节日放假、学生请假，还要另发英文通知给外籍教师。总之，凡是与教务有关的事情全由一个人包下来了。又如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除了管中外图书乐谱的采购、登记、分类、借还之外，还要代售进口乐谱。因为当时上海虽然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城市，却还没有一家书店出售适合专业教学用的乐谱。外商琴行出售的原版乐谱又贵得惊人，学校只好委托一家德商书店直接向德国定购乐谱，然后照成本卖给学生。地窖是堆放煤炭杂物的，现在用来做学生琴房。比较大的房间全都用作教室，校长室就在阳台上，在栏杆上面装上一排玻璃，既能挡风，又能遮雨，满亮堂的。有一年年底，学校也像别的大学一样，有了一点节余。别的大学都用那笔钱买了汽车，萧友梅考虑到学校还缺少一台开音乐会用的三角琴，于是把它用到节骨眼上。不久，一台崭新的伊巴赫牌三角琴从德国运到了上海。这台历尽沧

桑的三角琴现在还保留在上海音乐学院录音室，作为艰苦创业的历史的见证。至于汽车呢，这一次买不成，以后终萧友梅的一生，音专始终不曾有过一辆专用汽车。

先是蔡先生早于音乐院成立的是年年底，即向南京政府推荐萧友梅继任院长。但他一再谦辞，只以代理院长的名义领导全院工作。不幸到了1929年夏天，却发生了一场风波。起因是学校规定暑假期间学生留校住宿每人需交八元宿杂费。因为学校的宿舍是租来的，房租水电费不管你暑假不暑假一样照收不误，学校经费短绌也是实情。另一方面呢，照当时的物价计算，八元钱对一般穷苦学生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本来嘛，只要互相体谅，这样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不幸的是有人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希望事情闹大，指使学生跑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以便趁机取萧友梅而代之。结果萧友梅请求辞职，音乐院宣告停办。恰巧是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该法规定凡是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都应称为专科学校。音乐、绘画于是与陶业、制革、会计、保险、税务等等属于同一类。叨这个组织法的光，音乐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可是却从原来的大学地位降低了一级，改名为音乐专科学校。南京教育部仍聘萧友梅为校长。原音乐院的学生凭音乐专科学校的通知来校注册。没有收到通知的学生——其中也有冼星海——从此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平心而论，这次风潮的起因纯属经济问题，并没有政治性质。如此折腾，实在是萧友梅生平最痛心的一件事。

萧友梅的办学方针是因材施教，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教师，再由学校根据教师的具体情况统筹分配。主科分初、中、高三级。学生修满二十学分即可升级。何时修满不取决于时间的长